

清代西藏地方志序、跋的史料价值

——读几部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序、跋

赵心愚

[摘要]中国古代地方志多有序、跋,序跋已成为地方志的一个组成部分。清代西藏地方志与各地古地方志一样,也多有序、跋,有的还有多序多跋。本文以不同时期的《藏纪概》、《西藏见闻录》、《西藏志》、《西招图略》、《拉萨厅志》、《西藏图考》及《巴塘盐井乡土志》这七部方志的序、跋为例,逐一介绍其内容,并对重要观点、评价进行分析评述,在此基础上,分几个方面指出了清代西藏地方志序、跋的特点及在清代西藏方志史研究中的资料价值。

[关键词]清代;西藏地方志;方志序、跋;方志研究

中图分类号: C95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3926(2014)01—0207—09

作者简介:赵心愚(1953—),男,重庆人,西南民族大学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西南民族史、纳西族历史文化。四川成都 610041

方志序、跋是方志独立的组成部分,文字一般不多,但为构成方志的多种文体之一。方志序一般为说明文,也有近记叙文、散文者,一般分三类,一是自序,二是他序,三是代序。如以其位置分,又可分为前序、后序。所谓前序,即置于志前;所谓后序,则位于志之后。方志跋一般亦是一种说明文字,但与序一样,也有近记叙文者,一般置于志之后。中国古代方志尤其是元代之后的方志绝大多数有序,还有不少既有前序,又有后序或跋。古代方志的序、跋,是方志史研究的重要资料,不论是详述某部方志的优劣,其修志的得失,还是讨论某一时期、某一地区方志的变化发展,都应重视对方志序、跋的分析。

清代西藏方志是中国古代方志的一部分。从目前已知20多部清代西藏通志类、府县志类方志著作来看,清代西藏方志与全国其他地区的古方志一样,绝大多数有序文,有的一志还设有多序,有的则不仅有前序,还有后序与跋,有的序或跋还出自于名士之手。^①从目前已公开发表的清代西藏方志研究的成果来看,尽管有的研究者在某部方志的成书时间、著者或刻印、流传等问题的探讨中已提及其序或跋,但较全面地对清代西藏方志的序、跋作专门研究的成果还没有,有的西藏方志的序文甚至一直未引起相关研究者的注意。与

凡例、例言一样,清代西藏方志的序、跋也从一个方面反映了清代西藏方志的发展,由于其容量更大,数量更多,还可从中发现更多有关的重要资料与线索,因而非常有必要对其进行较为全面的专门研究与探讨。

由于存在一志多序,或既有前序,又有后序及跋的情况,清代西藏方志序、跋的数量比其凡例、例言要多得多。鉴于这样的情况,因篇幅所限,本文仅以《藏纪概》等七部私人编撰的有代表性的清代西藏方志的序、跋为例进行初步探讨。以下逐一简要介绍其主要内容,并作必要分析。

一、清代西藏方志史前期四部方志的序、跋

(一)唐肇《藏纪概·序》。《藏纪概》,分卷之初、卷之次、卷之尾三卷,李凤彩撰,成书于雍正年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已著录。^②《藏纪概》卷首有唐肇“雍正五年夏至前”所作序,吴丰培先生分析书中内容并据此署年认为,“此书之成远在雍正五年以前”,故将《藏纪概》“列于藏地志乘之首,以为藏志最早之本”^{[1](P.129)}。唐肇序作于“雍正五年夏至前”,应已是当年夏至快到之时,而其序文中已提到《纪概》之名和“此三卷书”,表明此书编辑后应成于雍正五年上半年,或者稍早一点。尽管如此,《藏纪概》仍是清代西藏地方志中目前见到的最早之作,比有的研究者提出的王世睿《进

《藏纪程》还要早几年,^③比传为果亲王著之《西藏志》也要早。

《藏纪概》卷首有两序,一是唐肇所撰序,为他序;一是撰者李凤彩所撰《〈藏纪概〉原由》,为自序。从两序内容来看,唐肇序对此书编撰及价值、特点的评述更详,故简要介绍分析唐肇序。唐肇在序中首先谈及明陈诚所著《西域行程记》一书,称其书所纪“盖其身历,非采摭传闻者可比,故史家不得弃之。”^④显然,唐将李凤彩所著《藏纪概》也视为经其“身历”所著之书,材料可信,不是依据传闻之作,这就一开篇已充分肯定了《藏纪概》的价值。唐肇所言,并非溢美之词,这是观书稿并与李凤彩“共相谈论”了解其经历后得出的看法。紧接着唐肇在序中简要写李凤彩“读书饶志节成孝廉”后于康熙末年“请纓”赴藏,“身历艰险冻馁,佐军门建练兵裕粮之上计,遂直抵乌斯藏”的经历,然后称李“驻招六阅月,谘访老练,记注殊异于彼中,所谓天象、地势、人类、物、事,点墨收之”。序中这一段文字,明确记李在拉萨的时间及进行的调查与分类记调查所获资料,这与李凤彩《藏纪概原由》所记也一致,强调了《藏纪概》所记为李凤彩在藏之经历和亲自调查所获。值得注意的是序中紧接着称“奚囊若干条,俾编辑之译合。”此语中“奚”当为“悉”。李凤彩在《藏纪概原由》中亦称“驻居数月,见其人之老成达事者,询其建置沿革即明世事,俱不能详考其系脉,姑就目击耳受者述之。”其最后亦言“归来述其见闻如此。”根据唐肇序,并结合李凤彩的自述,可知李凤彩最初有不少在藏搜集记录的资料,归来也进行了一定整理,即成光绪《江西通志·艺文志》所载李凤彩撰《西藏行军纪略》二卷。但从其书名看,应主要是按入藏、驻藏时间记其见闻,与后之《藏纪概》应有所不同。因此,根据唐肇序所记,结合此序写于“雍正五年夏至前”这一时间分析,《藏纪概》成书时间应在雍正五年初或稍早一点,不会“远在雍正五年前”。《西藏行军纪略》所记可能有不少内容后收入《藏纪概》中,这是两书资料上的关系,但编辑之后,《藏纪概》已另成一书,其成书时间也应另计。在以上内容之后,唐肇在序中又较为详细地叙述了《藏纪概》一书的内容,从列为斯编之冠的康熙皇帝的《论地理水源文》开始,一直到卷之尾所记的“天地人物事五者”,并对其记述方法作了评论。最后,唐肇用一段文字对《藏纪概》的价值再一次进行了肯定。^⑤唐肇生平不可考,从此序看,其对藏

事应十分关注,所作序文字虽不多,但重点突出。根据其序内容与署年可大致确定《藏纪概》成书时间。

(二) 卢文绍《西藏见闻录·跋》。《西藏见闻录》分上、下两卷,萧腾麟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已著录。^{[2] [P. 849]}此书著者曾领兵驻察木多五年,了解藏地情况。书成于乾隆初年,但刊于乾隆中期,刊印前其子作了一些编排,从清代西藏方志史上有着重要地位的《卫藏图识》、《卫藏通志》、《西藏图考》及《西藏新志》等所列参考书来看,《西藏见闻录》的影响远不及《西藏志》大,其流传范围应较小。上世纪80年代初,有研究者分析其书序与凡例后说“如是,(此书)可与乾隆《西藏志》互为补益,使之作为西藏早期方志(通志类)的体例和内容渐趋完善。”^{[3] [P. 28、29]}此处称“如是”,可见也未成定论,重要的是仍把是书与《西藏志》视作两书。几年之后,又有研究者提出,《西藏志》即《西藏见闻录》,两书实为一书。^[4]笔者曾撰文与之商榷,认为不能作出这两书实为一书的结论,并且在分析后指出,《西藏见闻录》的材料实际上多采择于《西藏志》,换言之即萧腾麟是在《西藏志》基础上撰《西藏见闻录》的。^⑥尽管学界对《西藏见闻录》与《西藏志》的关系存在不同看法,对《西藏见闻录》的资料价值也存在不同意见,但其成书于乾隆初,刊印于乾隆中期,在清代西藏方志史中也属较早之作,因此仍应当进一步研究。

《西藏见闻录》有多序多跋,在清代西藏地方志中是序跋最多的一部。此书之所以出现多序多跋,与著者之子萧锡珀广交名士,博征诸人作序有关。尽管这些序、跋中,有的多溢美之词,但均撰于乾隆年间,也有部分内容言之有物,因此仍有其资料价值。卢文绍字召弓,号矶渔,又号抱经,其所作跋本称“书后”,置于“书后”,实为“跋”,是其书三跋之一,作于乾隆三十九年。卢文绍跋一开始即指出“西藏,古吐蕃地也”,^⑦接着,简要叙唐宋至清初西藏与内地关系,其后称“雍正间,惩准噶尔之扰,使大臣良将镇抚之。”在这一段文字后,其跋才转而写萧腾麟及所著书。先称“峡江萧公十洲,以韬铃成进士,官川北。乾隆二年,以副戎移驻其地之所谓察木多者,盖西藏之门户也。”“十洲”萧腾麟字。后又写萧著其书“治军暇,为详记其土地、物产、风俗之殊异,为二十门以括之,名曰《西藏见闻录》。”再接下来,又写作跋事“今嗣松浦梓行于世,顷以示余。”此语中“顷”即“倾”。

“松浦”即萧腾麟儿子萧锡珀字。在此语后,跋又写阅其书稿后的赞誉与感叹“昔汉班勇威行西域,而且所记诸国事迹,范史即本之以为传。公之书其不然乎?”此语是对《西藏见闻录》的高度评价。班勇,东汉将领,班超之子,多次入西域,有再通西域之功,撰有《西域记》。“范史”,即史学家范晔所著《后汉书》。《后汉书·西域传》中,有不少材料采自于班勇所记,或基本照录班勇书中内容。卢文绍以此评价萧腾麟所著书,此跋本为应酬之作,今天看来,显得有些过誉溢美,但当时卢文绍也有可能确如此看此书。这是因为,在乾隆中期,有关西藏的地方志及其他著作非常少,卢为浙江余姚人,对西藏情况也了解有限,《西藏志》等抄本也当未见过,所以读此书后不免有这样高的评价。《西藏见闻录》内容分二十门,有《事迹》、《疆圉》、《山川》、《贡赋》、《服制》、《饮食》、《婚娶》、《梵刹》等,这些内容卢文绍在跋中均未作评述、议论。在高度评价其书后卢话锋一转称:“然余独于书中见公泽及枯骨一事,为之惘然感肃然,颂公之仁焉。”卢文绍跋中所言的“泽及枯骨”事,见《西藏见闻录》卷下《丧葬》。萧腾麟在此目中,先记藏区天葬、水葬等葬俗,又写其所感“余谓纵有地狱想亦不过如此……”,最后称“余尝巡视郊外,见髑髅满沟壑中……目击心伤……乃捐俸劳蕃民往拾之,越三日得二十余篋,不能备棺窑,择高阜地掘二大深池,分纳其中,取余旧衣各一袭覆……之后,每月捡埋一次。”从此段文字可知,萧腾麟到藏区后,见其葬俗与内地不同并发感叹,后又按自己的文化观念与理解而采取措施捡埋枯骨。这本是萧在藏区所经历的一件具体事,按志书的要求,《丧葬》目中应主要记当地葬俗,萧自己所为或不记,或略记即可,但萧对此着墨较多,除采取以上措施外,萧还“飭通事宣谕我天朝法度……”,主张改其葬俗,推行土葬。卢文绍阅其书稿后,在跋的后半部分对《丧葬》这一内容大发议论,写了一大段文字,认为萧此举是“导以天性之爱,耸以律法之严”,最后又将萧此举与汉代交趾太守锡光、九真太守任延在其任上导之礼仪相提并论,认为萧此举“乃在于无形也”,并言“使当二守之任岂不能为二守之所为哉!”与跋前半部分相比,这一评价更明显是溢美之词了。卢文绍为乾隆十七年(1752年)进士,官至侍读学士,好校书,为清代著名文献学家,阅书稿后有此看法也并不奇怪。总的来看,卢文绍这一跋尽管多为其

对“泽及枯骨”一事的议论文字,也有一些过誉之词,但反映了乾隆时期的人们尤其文人对《西藏见闻录》的看法,且就跋文的写作来看,文字流畅,说理亦透彻,因而也有其资料价值与研究价值。

(三)和宁《西藏志·序》。《西藏志》,不分卷,全书共30多目,成书于乾隆初年,未著撰人,《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已著录。^{[2] (P. 849)} 前已言及,就其影响来看,《西藏志》远比萧腾麟所著《西藏见闻录》大。但是,这一著作自乾隆年间以来,其著者为何人就一直存在不同看法,之后与之相关的成书时间问题,也存在着不同意见。乾隆五十七年鲁华祝在《卫藏图识·序》及此书例言中,都谈及《西藏志》,但序中称“无名氏”《西藏志》,例言中则称“旧有《西藏志》”,“不知作自谁氏”。^⑧ 吴丰培先生在考《西藏志》著者时,特别指出是书《寺庙》篇载有班禅乾隆六年坐床事,意即此书最后成书于此年。^⑨ 以前在讨论《西藏志》著者及成书时间问题时,人们多注意其志中的材料,但可能存在的材料补缀问题未引起足够的重视。2011年,笔者撰《〈西藏志考〉成书时间及著者考》一文,通过分析和比较《西藏志考》与《西藏志》篇目及所记内容,提出《西藏志》实际上是在《西藏志考》基础上整理改编而成的,而《西藏志考》成书时间应在乾隆元年下半年或次年年初。^[5] 这一看法,既涉及到《西藏志》著者及成书时间问题,也涉及到《西藏志》与《西藏见闻录》的相互关系问题。

《西藏志》成书之后,长期以抄本流传,到马丕瑛、盛绳祖乾隆五十七年编著《卫藏图识》时,已称“旧有《西藏志》”。此志本无序,和宁《西藏志·序》作于此志刊印时,也为他序。和宁此序从谈身毒开始,后便引经据典,考证与西藏、吐蕃相关的史地问题。序称“杜氏《通典》,吐蕃在吐谷浑西南,其国都号为逻娑城。《旧唐书·吐蕃传》,号为罗些城。《扶南传》云,舍卫国隶属天竺;伽尸国一名波罗奈国,亦名波罗国、奈斯国。释道安《西域志》谓波罗奈斯国,乃佛转法轮处。”其语中,杜氏《通典》,即唐杜佑所著《通典》,其书卷一百九十中记有《吐蕃》。《扶南传》,三国康泰著,记有在一百多“国”的见闻,《水经注》又称其为《扶南记》,其书早佚,但所记多部古籍中有引文,“舍卫国”、“伽尸国”为其记载中的“国”。在这一段文字后,其序接着又写道“今考《西藏志》,名其地曰拉萨,其台吉有名颇罗鼐者。则知古籍所载,曰逻娑、曰罗些、曰拉萨,乃译音之近似;曰波罗奈斯、

曰波罗祭斯、曰颇罗鼐,又字画之舛讹。总之,皆西方佛地也。”和宁序中这一考证,前面一半是对的,即唐代逻娑即后之拉萨,此是译音无定字,但后面一半却牵强。颇罗鼐是西藏历史上一著名人物,清康熙末以后,被清王朝先后封台吉、贝子、贝勒、郡王,其在位时,西藏地方与清王朝中央政府的关系正常,西藏社会也较稳定。地名与人名本有根本的区别,并不是“字画之舛讹”,所以和宁后面一半考证可说毫无可信之处。这一错误之后,序文又进一步言佛地及佛教传入中原。和宁先基本沿传统说法,简要写东汉明帝时,自西域用白马驮经东来,后于洛阳建白马寺,“由是金光流照,法轮东转”,佛教正式进入中原;再言佛地“方物事迹”张骞、甘英“遍阅西土未有成书”,“即唐之元奘法师游西域十七年,撰记十二卷,章多缺略,或于考古者之遗憾欤。”此般文字中提到的张骞,即西汉通西域的使者,后封“博望侯”;“元奘”,即“玄奘”,也即西天取经的唐三藏、唐僧,清代避讳改作“元奘”;所谓“撰记十二卷”,即唐玄奘所著《大唐西域记》。应当指出,和宁序中此段文字同样存在很大问题。因为张骞所通西域,玄奘西行取经之地,并不是西藏,和宁将西藏及前所提及之地全归为“西方佛地”,实际上非常牵强。在以上这些内容之后,序言才叙西藏与清中央政府关系,并称:清“内臣驻扎其地,镇抚部落,护持黄教”。又言“况乎西藏为生佛之地,兴教之方,其山川疆域,风俗程途,尤不可不详其记载也。”序中此语,是明确强调西藏修志的重要性、必要性。最后此序称“是书传为国朝果亲王所撰,戊申得自成都抄本,爰付剞劂,以公同志云尔。”此序署年为“乾隆五十七年岁次壬子”,署衔为“关中丞宣使者”。^⑩和宁,后避讳改和瑛,乾隆五十八年充西藏办事大臣,在藏八年。戊申年,即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当时和宁任四川按察使,在成都筹办进藏川军饷银火药的运输事务。在这一段时间里,和宁在成都搜寻西藏相关资料,获得《西藏志》抄本,之后将其正式刻印。从此序署年及署衔看,交刻印已是和宁任陕西布政使期间。^⑪从刻印《西藏志》看,此时和宁尽管还未入藏,但关心藏事。和宁此序尽管前面多牵强附会之言,也有不少套话,但考拉萨即唐代吐蕃逻娑,强调西藏修志必要性,尤其明确记有《西藏志》抄本及刊印情况,因而在清代西藏方志史研究中有重要的价值。

(四) 松筠《西招图略·序》。《西招图略》,

成书、刻印于嘉庆初年,松筠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部分著录。^⑫松筠为清乾隆末嘉庆初的驻藏大臣,《清史稿》有传,《西招图略》一书是其记藏政管理经验的一部著作,前文后图。此书刻印之后,影响较大,关心藏事者多注意此书记载,其后的西藏地方志也多引其材料。比如,此书刻印不久,嘉庆《四川通志·西域志》就多处引用其书中的材料。又比如,今北京国家图书馆善本部藏有乾隆时期《西藏志》抄本,末有小真书题跋两条,为龚自珍阅后所书。其第二条为“此书无作者名氏,取和泰庵、松湘浦两尚书之书合观之,百余年来西事备矣。”^[6]有学者认为,龚自珍题跋中所说的松湘浦书,即松筠的《西藏巡边记》等。^[7](P.258)这一看法存在明显问题,至少不明确。分析龚自珍所言,其书实际上应主要是指《西招图略》。龚自珍题跋写于道光初年,同样是在道光年间,王师道称此书“令人开卷了然”,又鉴于此书“旧文漫漶,因重镌以公同志”。^[8]之所以重印,是因为《西招图略》的价值与影响大,关心藏事者需要查阅。又如,光绪年间,黄沛翹撰《西藏图考》,其例言在第一条中明确将《西招图略》列入引用重要资料书目,其卷一中有“西招原图”,即临摹的《西招图略》中的十二幅图;其卷二有“续审隘篇”,此篇前半篇照录《西招图略·审隘》全文。除以上之外,观黄沛翹所著书,全书还有不少地方引松筠《西招图略》材料。由此可见,《西招图略》在光绪年间仍对西藏方志编撰有很大的影响。清代西藏地方志出版最晚者为许光世、蔡晋成编著的《西藏新志》,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才正式出版。其书例言第六条所列引用书目中,有松筠《藏宁路程》。查松筠原书可知,《藏宁路程》附于《西招图略》之后,实为《西招图略》一部分。因此,直至清末,编写西藏方志仍注意参考松筠此书。到民国时期,陈观浚撰《西藏志》,仍大量引用《西招图略》中的材料。

《西招图略》本只有一序,此书作者松筠所撰,为自序。道光二十七年成绵道篆王师道重刻时,撰有《重刻〈西招图略〉序》,置于其内容二十条之后,为他序,也当为后序。在其重刻本之后,王师道还写有一跋。松筠《西招图略·序》文字不长,仅几段话。由于乾隆末年廓尔喀侵扰,虽被清军击退,但藏地疮痍满目,有边无防,松筠任驻藏大臣后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如何安边、固边,所以序文一开始即言“守边之要,忠、信、笃、敬也,莫不本

乎格、致、诚、正。故格物所以穷理，致知所以通俗，诚意所以不欺，正心所以寡欲，忠、信、笃、敬于是乎行以之。”这一段文字先不言其书，而是首先强调“忠信笃敬”称之为“守边之要”。松筠还提出要做到“忠信笃敬”，首先需要“格致诚正”。这一段话，是松筠对后任的重要交代，也可视之为其在藏几年任职的理念与经验体会。紧接着其序又写道“钦承圣训：教以宽柔无分遐迩，一皆羁縻而向化怀德，是在修德也。然修德者必矜细行，而图治者宜防未然。”这一段话，是以圣训为据，强调“修德者必矜细行”，“图治者宜防未然”，实际上是谈其著此书的原由及书的主要精神。在松筠看来，驻藏大臣既是修德者，也是图治者。其序后又称“因书二十有八条以叙其事略，复绘之图以明其方輿，名之曰《西招图略》庶便于交代以口述之未尽者。”与以前内容比较，这一段文字明确谈到了其所著书，即文有二十八条，又绘有图，书名因此定为《西招图略》，而且又谈及著书目的。最后此序写道“后之奉命驻藏君子，其尚有以发于予所欲言而不及者，尤厚望焉。是为序。”其后署年为“嘉庆三年中秋日”。¹³松筠此序，前面两段话并未像有的自序那样一开始便言其著作，而是说理，略显空泛，但其后的内容则非常明确，也十分重要。由于目前见到的《西招图略》仅以二十八条内容部分单行，而其书之后《图说》部分则又以《西藏图说》单行，所以不少研究者以为《西招图略》原本无图，又以为《图说》本名《西藏图说》，为松筠《西招图略》之外的又一著作。¹⁴从松筠自序所叙已可清楚地看到，二十八条与图说均本为《西招图略》一书的内容；这是书名中有一“图”字也有“略”字的原因，而有此两部分内容都是“便于交代以口述之未尽者”，尤其是方輿，不绘图无法讲清。在清代西藏方志史研究中，弄清《西招图略》与《西藏图治》关系很有必要，而松筠自序，则是辨明这一关系的最重要的材料。

二、清代西藏方志史后期三部方志的序

(五) 李梦皋《拉萨厅志·序》。《拉萨厅志》分卷上、卷下，李梦皋撰，书成于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只有抄本存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已著录。^{[2] P. 852}在清代西藏地方志中，府县志很少，名“厅志”者只有此书。有研究者指出“西藏府县之志，昔所未闻，有则自《拉萨厅志》始。”为何称作“厅志”呢？这位研究者认为“清代对于西藏地区，久以内地之府县视之，在建置未曾完备之

时，概用厅州之制。”^{[9] P. 136}此说显然只是一种推测。考清道光年间，清于西藏各地并未正式设府、县、厅，清代西藏地方志中及各种游记、纪程之作中，也没有在西藏概用厅州之制的任何记载。为何要称之为“厅志”，可能只有发现新的材料后才能作出解释。由于此志长期只有抄本存世，影响很小，专门研究此志的成果亦少。房建昌先生在《西藏研究》2010年第6期上发表《伪造的吴丰培先生所藏〈道光拉萨厅志〉手抄本》一文，通过分析其序及所记站程路线，认为此志“实为伪作。”在清代西藏方志研究中，这的确是一重要的新发现，但从上下卷重要的内容看，称其全书为“伪作”，当还需要进一步的材料。

《拉萨厅志》前只有一序，为其志作者李梦皋撰，为自序。其序开始一段文字为“夏《禹贡》赋之□，《周礼》职方所掌，凡邑皆有志。拉萨者，未有志也，盖□缺典。余在拉萨数十年矣，阅西番地方，颇知晓撰志之难也。”由于抄本漫漶，这段文字缺二字，从所记内容来看，后一处缺字当为“因”字或“其”字，言拉萨当时尚无史地著作可作参考。作者自称在拉萨已数十年，是为官还是经商，已难考，但从时间上推算，可能嘉庆年间就已在当地了。从作者以上叙述来看，其撰此志前应作过一些调查。其序接着又言“宋范成大作《吴郡志》，明康海纂《武功志》，赅赅然，尤为近古，盖才学识兼修矣。”宋代范成大、明代康海，都是历史上的方志名家，前者所著《吴郡志》被誉为地方善本，后者所纂《武功县志》，也为方志名作，但褒贬不一。从这一段内容看，李梦皋对中国宋、明方志应较为熟悉，也可能正是读宋明方志而有了撰此志的想法。其序接着写道“是故，志疆域，土田示人，以经画也；志沿革，政治示人，以法守也。忘（志）载山川、寺庙，则民风之淳；土产、置造，是土人之所为。故必究其始终，详其得失，考之往古而不悖，质今世而无议，传之来兹而可信也。”这一段话，应是作者自己提出的修志要求。最后其序称“案上观牒通志，考往古之事迹亦备，辑之成志。”序言署年为“道光二十五年乙巳仲秋。”¹⁵通观全序，作者未言何时开始撰写，也未谈及所著志书的结构及主要篇目，作者生平等也未谈及，为何名为《拉萨厅志》也无记述。从方志序的写作来看，此序多言之不具体，未能尽可能提供读者想了解的信息，但序中可知作者在拉萨多年，从署年也可知其成书的具体时间，因而也有一定价值，至少反映出道光年间

也有新的西藏方志成书。

(六) 丁士彬《西藏图考·序》。《西藏图考》八卷,首一卷,光绪十二年(1886年)成书,当年秋刊印,黄沛翘撰,《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已著录。^{[2] [P. 851]}《西藏图考》是清代西藏地方志中的一部重要的方志著作,作者黄沛翘广搜材料,勤于考证,如其书例言所说“汇群书而互证,集众说以认同”,最后编成是书。由于此书材料丰富,所载有依据、有考证,“故前人有将此书推为记载藏事诸书中最佳者”,黄苇先生主编的《中国地方志辞典》也将其列为“著名方志”。^{[10] [P. 170]}但是,黄沛翘毕竟未到过西藏,只是根据已有古籍文献,尤其是已有的西藏方志中的材料来撰写此书,书中部分内容难免存在一些错误。清末入藏并撰有《喀木西南纪程》的程凤翔在其著作中就曾言“《西域志》、《西藏志》、《卫藏图识》、《西域闻见录》,各皆一代专书,黄氏沛翘又汇群书而为《西藏图志》,亦云美善兼收矣,独于喀木西南,怒江内外诸藏地,略而不详,或记之而颠倒错乱。”^[11]程凤翔此言表明,其入藏时应重点阅过《西藏图考》,到今西南东南部后,又通过实地观察,再比较书中所记,发现了黄沛翘所著书的一些不足和错误之处。尽管如此,《西藏图考》仍是清代西藏地方志中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方志著作,它的出版,标志着清代西藏方志第二个高潮的兴起。

《西藏图考》有序文四篇,均作于光绪十二年,也均为他序,本文只简要介绍并分析第一篇,此序为丁士彬撰。丁士彬,河南固始人,曾任职四川成绵道,光绪初曾因都江堰工程为大水冲毁被革职留用,《清史稿》丁宝楨传中对此事有记载。其序从癸未年(光绪九年,1883年)廓尔喀商人与西藏地方冲突写起,又谈及次年其奉命“驰往勘办”,因“和议有成”,“乃退次于巴塘候旨”,后返回。道员丁士彬入藏查办事,《清德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六有记载。紧接着,序文用一段文字写英圭黎(英吉利)早在控制印度之后就欲入西藏进而达中国内地,只是一时未能得逞,再明确指出“然则今日之藏卫,其关系中外利益数倍于昔。”这一段内容,已道出当时西藏的战略地位和研究西藏的重要性与紧迫性。其后序文便称“而考其山川险要,与其道路出入、关隘分歧,尤今日之急务也。”山川险要,道路出入,关隘分歧,正是地方志的内容,作者此言实际上是强调在当时形势下要尽快编修西藏方志,称其为“今日之急务”。接下来,序文又写

道“士彬前于被命后,访求各种舆图及诸家记载,携之行篋。凡至一处,不惮咨询。稽其异同,察其风气,欲他时纂集成书,为筹边之一助。”这一段文字,虽是回忆当年奉命赴藏地时搜集材料和每到一地即访问调查的情况,实则为下面评价《西藏图考》作了准备。其后序文便称“事忽中辍,虽可以藏拙偷安,而于心终有耿耿焉。同官黄君寿著,本经世才,留心时务,以所撰《西藏图考》见示,仍过自虚抑,殷殷下问。士彬受而读之,则凡昔所裒辑者,君皆已有之,且加详焉;即有余于君之外者,类皆郢书燕说不足为轻重。”这一大段文字,是序作者对《西藏图考》材料丰富及选择得当的高度评价。这种评价,不是一般的过誉之词,应是序作者的真实感受。所以之后其序又说“士彬于是服君搜讨之勤,且补士彬之不逮,举向之所为耿耿者,亦且释然矣。”这就进一步肯定了黄沛翘及所著之书。此序后面内容多为作者进一步的感叹与希望,本文不再介绍。总的来看,这篇序文虽有套话与空泛之处,但写出了《西藏图考》编撰出版时的西藏形势,并用自身经历和有过的计划对《西藏图考》作了高度评价。因此,不论从内容还是从笔法看,此篇序文应是清代西藏地方志序跋中既有特色也较有价值的一篇,亦是清代西藏方志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重要材料。

(七) 段鹏瑞《巴塘盐井乡土志·自序》。《巴塘盐井乡土志》,分上编、下编,共40目,成书于宣统元年(1909年),铅印于宣统三年(1911年),《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已著录。^{[2] [P. 853]}此志是清代西藏地方志中唯一一部乡土志,也是成书并出版于清末的一部西藏方志,其书名本为《巴塘盐井乡土志》,但现在有的方志丛刊中,将其名已改为《盐井乡土志》。^⑩《巴塘盐井乡土志》编纂者段鹏瑞,云南剑川人,字云逵,光绪辛卯举人,后于光绪末随赵尔丰入川边。盐井之地,清代属四川巴塘土司,清末改土归流,拟设县。段抵盐井后,为调查委员,后主盐井事。任职盐井期间,段曾奉命由盐井到今西藏察隅一带勘查,并绘制《闷空全境舆图》、《杂瑜全境舆图》及《桑昂曲宗大江西面舆图》,三图皆附有文字说明。从其书自序署年来看,《巴塘盐井乡土志》编于宣统初。

《巴塘盐井乡土志》本有两序,一为其同里又为姻兄的赵藩所作,为他序;另一序则为段写于盐井见山楼的自序。两序比较,前者文字较少,基本属应酬之作;后者文字较长,而且内容中有一些作

者亲自调查所获的重要材料。其序首先用一段文字叙盐井历史,称“盐井隶巴塘非古也。考余庆远《维西见闻录·序》载,明万历年间丽江土知府木氏寢强,尝以么些兵攻吐番,吐番降,木氏遂屠其民而徙其么些兵以戍之,故其时巴塘、里塘皆为木氏有,盐井为巴塘之瓯脱从(此)可知已。”段鹏瑞在这段内容中,以余庆远所记为据来谈其序开始就提出的看法,并明确称盐井为“瓯脱”。余庆远,字璟度,湖北安陆人,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年随其兄至云南维西,在维西五年,根据自己的观察与调查,写下《维西见闻录》这篇记川、滇、藏毗邻地区历史、文化、民族的著名游记。段序第一段文字中的主要内容,即出自《维西见闻录·自序》。万历年间丽江纳西族木氏土司北向发展,控制今巴塘、里塘一带的情况,其他史志亦有记载,《木氏宦谱》中也有记载,为历史事实,段以此说盐井与巴塘关系。紧接着,其序又进一步叙述清初吴三桂叛清后巴塘、里塘的变化及之后隶四川而以土官羁縻的历史经过。之后又言“土人谓木氏为木天王,今尚有此名称。”序文这一段所言存在错误。这是因为,吴三桂及其孙“略青海”,也就是拉拢蒙古和硕特部时,和硕特部早已击败木氏土司军队,控制了巴塘、里塘一带,但木氏土司在这一带的巨大影响的确一直存在,所以当地人仍称木氏为“木天王”。在言历史之后,其序又言作者于光绪丁未岁(1907年)“奉檄司榷其地”刚到时刻感到惊讶的一件事“甫至,聆其语言,讶与丽江相近。问之通事,则曰实丽江之么些语也。惟以土当川藏之交,故又杂以藏话,且土音稍别耳。”如果段不是剑川人或不是亲自到其地并询问通事,也不可能知此事,重要的是,段将此事写入序言之中,而且以此证盐井历史“然则盐井之向归木氏为可证矣。”其后,序文转而简要写盐井的地理环境及赵尔丰为川边大臣在这一地区推行的改土归流及开垦、兴学等各种措施。在这一段文字后,又称其兼学堂总理,面临“各校苦乏课本”的窘境,于是要求除算学外的各课均由教员“就其地之风土沿革编辑,俾知所考”。同时,段还向在盐厘局的年长的藏族工作人员了解盐井历史,并请当地懂藏文者将藏文之“掌故古本”对通事译而告之。^①在这样的基础上,段最后编成此志。这是当地的第一部方志,有的研究者称其为“川边地志较优之作”^{[12] (P. 139)}。此序署年为“宣统元年冬十二月”,应为是书成之时。从序言最后部分还可发现,此志成书时初

定名为《巴塘盐井乡土地理志》,直到赵藩宣统三年夏四月作序时,仍为此名,应是正式出版时才改为《巴塘盐井乡土志》。在清代西藏地方志之序言中,此序是写得较好的一篇自序,没有空话、套话,虽然部分内容也存在错误,但除了叙其书编写目的、经过和材料来源等外,还记有一些重要的经作者观察所获的材料,因此,此序不仅是清代西藏方志史研究的重要材料,也是纳西族史研究的重要材料。

三、以上几部方志序、跋的特点与价值

宋王应麟《辞学指南》说“序者,序典籍之所以作。”虽然字不多,但讲清了序之作用。《康熙字典》引《篇海》称“足后为跋。故书文字后曰跋。”严格地讲,这一解释只说了跋这一体裁在书文中所处位置,而没有说明其作用。实际上,跋与序作用差不多,故内容亦差不多。以上逐一对《藏纪概》、《西藏见闻录》、《西藏志》、《西招图略》、《拉萨厅志》、《西藏图考》及《巴塘盐井乡土志》这七部清代西藏地方志的七篇序、跋的主要内容作了简要介绍与分析,其中跋一篇,序六篇,而序之中有自序,也有他序。通过简介与分析,可以看出,七篇序跋各有侧重,各有特色,多序其书之所以作,介绍书之写作经过与困难及成书中的相关情况,并表达了作者一些见解与主张,论述了西藏修志的重要性;其写法有的以说明为主,有的则夹叙夹议。总的来看,除均起到“志之窗口”作用外,这七篇序、跋有以下特点与价值。

第一,都强调了修志材料的重要性。通观这七篇序、跋,可以说篇篇都言及材料,都谈及搜集材料的情况与困难,也都强调材料对于修志的重要性。如唐肇《藏纪概·序》中,一开始即谈到明陈诚《西域行程记》,以此肯定李凤彩《藏纪概》一书材料来自亲自经历,不是依据道听途说之言所作,因而可信。在其后序文中,又写李凤彩在拉萨期间,“谘访老练,记注殊异与彼中”,这又着重指出其书材料是其在藏地调查所得。卢文绍《西藏见闻录·跋》中先明确写萧腾麟驻察木多,再言:“治军暇,为详记其土地、物产、风俗之殊异,为二十门”。这样写,实际上也是突出萧腾麟所著书材料来自其驻察木多期间的搜集与调查,强调其材料是第一手的,因而是可信的。段鹏瑞《巴塘盐井乡土志·自序》因是自序,在这一点上写得更明白,也更详细。序中除了叙要求各课程教员“就其地之风土沿革编辑,俾知可考”外,段本人亦向年

长的藏族人士了解当地历史,还请当地懂藏文者将藏文之“掌故古本”翻译后通过通事告诉他。从这些具体记载可看出,段鹏瑞编《巴塘盐井乡土志》时高度重视修志材料,除亲自在当地调查了解外,还重视在藏文文献中去搜集材料。其书材料来自调查,来自藏文古籍,其可信度就不必赘言。在本文谈及的七部西藏地方志中,多部方志的作者都到过藏区,并在藏区生活过一段时间,只有《西藏图考》编者黄沛翹未到过藏区,是个例外。^⑧但是,黄沛翹虽然未到过藏区,在材料搜集考订上下的功夫也非同一般。所以,丁士彬在序中对其大加称赞,充分肯定,实际上这也强调了修志材料的重要性。

第二,都反映了西藏地方志的特点。这七篇序、跋在说明或议论、记叙写作原由、成书有关情况以及材料来源的内容中,都反映了西藏地方志的特点,只是相对而言,程度有所不同。因此,一读其内容,便知是西藏地方志的序、跋。如卢文绍《西藏见闻录·跋》,虽然其内容中没有对萧腾麟书中的《事迹》、《疆圉》、《山川》、《饮食》、《婚娶》、《梵刹》等篇目作出评论,但对其《丧葬》篇的内容,尤其是对萧腾麟所采取的措施写了一大段文字,又大发感叹,读者一读其内容,便知这是一部西藏方志的跋。又如松筠《西招图略·序》,文字不多,虽然前面多半文字均在言理,略显空泛,但之后称“……名之曰《西招图略》,庶便于交代以口述之未尽者”。向谁交待呢?当然是向在任的驻藏大臣交待。其后又说“后之奉命驻藏君子……”这又是指后任的驻藏大臣。因此,序文同样反映了西藏地方志的特点。即使是有学者指其为伪作的《拉萨厅志》,就其序看,李梦皋在序言中明确称“余在拉萨数十年矣,阅西番地方,颇知晓撰志之难也。”虽然序中仅此一句话谈到拉萨及西番,但读其序便知其书为一部有关西藏的著作。前已言及,和宁在《西藏志·序》中有不少牵强附会之言,也有不少套话,但其序内容多与西藏历史相关,可以说在这七篇序、跋中,其西藏地方志特点反映得非常充分。前已谈到的卢文绍《西藏见闻录·跋》,一开始即称“西藏,古吐蕃地也。”这种写法,开篇即反映了西藏地方志特点,也必然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使读者产生阅读兴趣。

第三,都记载了清代西藏地方志发展、清代西藏方志史研究和与藏区相关的一些重要资料。可以说,以上七篇序、跋,都有一定资料价值。比如,

和宁《西藏志·序》为刻印时所作序,虽然序中一些考证有错,一些看法也有误,但其序强调了西藏编修地方志的重要性、必要性,序言中明确写道:“是书传为国朝果亲王所撰,戊申得自成都抄本,爰付剞劂,以公同志云尔。”序最后又有明确署年与署衔。尽管只是几句话,文字不多,但和宁在此序中给清代西藏方志史研究留下了宝贵资料与相关信息。首先从其序所记可知,在乾隆时期,早已有《西藏志》为果亲王撰的说法,虽然和宁称“传为”,也就是未肯定,但毕竟有此一说存在,在《西藏志》著者的探讨中,这是非常重要的资料。其次,可知后来见到的《西藏志》和宁刻本的底本是“戊申得自成都”的一种“抄本”。也就是说,在其刻印之前,《西藏志》当仍以抄本在流传。并且,其抄本在驻藏大臣进出藏驻地成都获得。其三,刻印时间即其序之署年,而刻印目的则是“以公同志云尔”。乾隆末年,清代西藏地方志发展仍处于第一个高潮,而《西藏志》则是第一个高潮中的一个重要成果。此时和宁将其刻印,既反映出乾隆末年人们对《西藏志》价值的关注与重视,也反映出形势的变化又出现了不少“同志”,即关注关心藏事者。可想而知,如果没有此序,这些宝贵的资料我们今天将难以觅得。又如,段鹏瑞《巴塘盐井乡土志·自序》除了象一般序言那样介绍盐井历史、地理以及此书编写经过和材料来源外,重要的是通过亲自调查,向通事询问,弄清楚了盐井当地当时通行的语言实为“丽江么些语”,只不过因处川、藏、滇交界地区,所以杂有藏语,语音稍别耳。同样值得一提的是,通过语言调查,段证实了文献记载的史实,即丽江木氏土司曾控制了巴塘、里塘一带,并在川藏滇毗邻地区有较大影响。毫无疑问,段自序中的这些材料,对于这一带藏区的方志史研究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也是纳西族史研究不可多得的材料。

清代西藏地方志的序、跋有其特点,也有着重要的资料价值,需要我们进一步去研究、去发掘。可以这样讲,如果不重视这些序、跋,不去深入研究,清代西藏方志史的研究将不可能真正深入,其成果至少是不完整的。

注释:

①《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录的清代西藏地方志为17部,明显有遗漏。笔者根据目前已有的资料和研究成果统计,认为至少有27部。见拙文“《〈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西藏地区清代方志的著录问题》,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13年第4期。

②《藏纪概》本无撰者名氏,“卷之初”署“修江铁船居士纪次,吴陵奎峰山人读辑。”由于志前唐肇序称著者为“修江李公”,其自述中有“彩以书生从戎”、“铁船本孝廉”语,朱士嘉《中国地方志综录》中著录作“李彩”(《中国地方志综录》第303页,商务印书馆1958年增订本)。吴丰培先生据光绪《江西通志·艺文志》等有关记载考证,知铁船居士名李凤彩,后即以此名著录。见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第849页,中华书局1985年。

③肖幼琳、黄辛建、彭升红《我国首批西藏志地方产生的原因及其特点》一文,将《进藏纪程》列为首批西藏志中的通志类著作。见其文,载《中国藏学》2009年第4期。

④唐肇序中本作《西域使程记》,误。明陈诚,员外郎,曾出使西域,著有《西域番国志》、《西域行程记》。

⑤本文所引唐肇《藏纪概·序》材料,引自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之《藏纪概》,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

⑥赵心愚《〈西藏志〉著者辨》,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8年第3期。笔者的看法,后得到邓锐龄先生的肯定。见邓锐龄:《读〈西藏志〉札记》,载《中国藏学》2005年第2期。

⑦本文所引卢文绍《西藏见闻录·跋》及《丧葬》目材料,引自张羽新主编《中国西藏及甘青川滇藏区方志汇编》第二册之《西藏见闻录》,学苑出版社2003年。

⑧《卫藏图识·序》及例言均见西藏社会科学院西藏学汉文文献编辑室编《西藏学文献丛书别辑》之《卫藏图识》影印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5年。

⑨吴丰培先生的看法见《吴丰培边事题跋集》第135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⑩本文所引和宁《西藏志·序》材料,均引自西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西藏志》。

⑪邓锐龄先生在《读〈西藏志〉札记》一文中已指出《西藏志》刊于和宁改任陕西布政使期间,即乾隆五十五年(1790)至五十八年间。其文载《中国藏学》2005年第2期。

⑫北京天文台主编《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第850页,中华书局1985年。所谓“部分著录”,指只著录其《图说》部分,称之为《西藏图说》。

⑬本文所引松筠《西招图略·序》材料,均引自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西招图略》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⑭《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上著录《西藏图说》而不著录《西招图略》,显然是认为二者各为一书。由于只著录《西藏图说》,故本文称为“部分著录”。何金文先生称《西招图略》“以治理西藏之方略为主”,内容仅为“政事类”,即认为此书仅有二十八条。见其著《西藏志书述略》第35页,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

图书馆学会1985年铅印本。

⑮本文所引李梦皋《拉萨厅志·序》材料,均引自《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之《拉萨厅志》,巴蜀出版社1995年。序中有“志载山川寺庙”一语,但“志”误为“忘”。

⑯如《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中,就将书名改为《盐井乡土志》。见其辑,巴蜀书社1995年。之所以改名,是采纳吴丰培先生的意见。见《吴丰培边事题跋集》第139页,新疆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⑰从此言看,段实际上同样重视藏文史籍中的材料。本文所引段鹏瑞《巴塘盐井乡土志·自序》材料,均引自《中国地方志集成——西藏府县志辑》之《盐井乡土志》,巴蜀书社1995年。

⑱《西藏志》目前有学者提出为驻藏衙门官员所作。笔者虽言目前不能简单否定果亲王著的说法,但也指出不可能是果亲王个人所作,而是其提出要求,其手下之人包括驻藏官员按其要求汇集材料编成。

参考文献:

- [1] 吴丰培. 藏纪概·跋[A]//吴丰培边事题跋集[C].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 [2] 北京天文台主编. 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Z].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
- [3] 何金文. 西藏志书述略[M]. 吉林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吉林省图书馆学会, 1985年铅印本.
- [4] 张羽新. 《西藏志》即萧腾麟所著《西藏见闻录》考[J]. 文献, 1986(1).
- [5] 赵心愚. 《西藏志考》成书时间及著者考[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1(12).
- [6] 邓锐龄. 读《西藏志》札记[J]. 中国藏学, 2005(2).
- [7] 龚自珍全集[C].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 [8] 《西招图略》王师道序[A]//中央民族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 西招图略[M]. 道光二十七年刻本.
- [9] 吴丰培. 拉萨厅志·跋[A]//吴丰培边事题跋集[C].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 [10] 黄苇主编. 中国地方志辞典[Z]. 合肥: 黄山书社, 1986.
- [11] 程凤翔. 喀木西南纪程[A]//吴丰培辑. 川藏游踪汇编(三)[Z]. 成都: 四川民族出版社, 1985.
- [12] 吴丰培. 盐井乡土志·跋[A]//吴丰培边事题跋集[C].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98.

收稿日期: 2013-10-27 责任编辑 杨春蓉